

不对称全球化：历史、理论与当代中国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贾根良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以自由贸易、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要特征，因此，目前中国多数学者在解读“一带一路”倡议和撰写有关应对中美贸易冲突文章时，仍然沿着这种传统思路。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否符合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的一般性规律呢？从英国、美国、德国等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看，在从欠发达经济保护国为发达经济的过程中，均走了一条“保护本国市场并打开别国市场”的不对称全球化道路。这明显地不同于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在近来发生的美中贸易冲突中，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已将其历史上这种“不对称全球化”道路推向了极端：一方面，它通过高关税保护和严禁中国高科技企业赴美投资来保护其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却又迫使中国对美国产品和跨国公司的投资更加敞开大门，并企图通过所谓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规则”（技术保护主义）将中国经济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在这种现实挑战的大背景下，对发达国家历史上所走过的“不对称全球化”道路进行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英国道路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棉纺织业是其爆发工业革命的产业；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前的近百年时间里，印度棉织品由于质量精良、穿着舒适、花色美丽在西方世界打遍天下无对手，是当时国际贸易的大宗高科技产品，需求极其旺盛。虽然英国原生的羊毛纺织业在17世纪末已经占据世界统治地位，但却无法与印度的棉织品竞争。然而，针对英国棉纺织业落后的状况，英国并没有采取自由贸易和承接印度产业转移的战略，而是采取了在禁止性高关税保护之下的进口替代战略，对此，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 List, 1789—1846）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禁止输入它自己工厂也在制造的那一类商品——印度的棉制品与丝织品。这个禁令是绝对的，毫无伸缩余地的。……但是它却十分乐意把这些印度产的精美得多的织物在较低价格下供应欧洲大陆各国，情愿把这个廉价的利益让给它们，而自己却一无沾染。”为了配合这种高关税保护政策，英国还实行了一种辅助性战略：禁止英国的所有殖民地销售印度棉布，使之成为英国棉织品的独占市场；只允许垄断印度殖民地贸易的东印度公司把印度棉织品销往欧洲大陆各国以摧毁这些国家的棉纺织业。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全球化”战略。

刚开始时，在保护的大墙里面，英国通过进口替代生产的棉麻混纺布还无法与印度棉织品竞争，它们面临两个关键性挑战：除了解决染色和固色难题外，还不得不设法生产出适合于印染的布匹，实现对印度全棉布的替代。正是在这种禁止性高关税保护之下和犹如黑洞般的市场迫切需求刺激下，英国工匠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终于解决了染色和固色难题，并发明了生产率比手工纺织高几十倍的棉纺织机械，英国工业革命就这样爆发了。通过保护本国市场并借道其殖民地的外围市场，英国在1830年完成工业革命后，就针对欧洲大陆的宿敌法国、德国展开了自由贸易政策的凌厉攻势，试图将后者变成英国棉织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法国因迷信自由贸易学说，曾一度被英国战略所迷惑，大大推迟了其崛起的进程；而德国则很快就识破了英国的伎俩，其经济实力在1900年超过了英国。

恩格斯（F. Engels, 1820—1895）在1888年为马克思（K. H. Marx, 1818—1883）《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所作的序言中，对英国的这种“不对称全球化”战略做了很好的总结：

现代工业体系即依靠用蒸汽发动的机器的生产，就是在保护关税制度的羽翼之下于18世纪最后三十多年中在英国发展起来的。而且，好像保护关税还不够似的，反而对法国革命的几次战争又帮了忙，确保了英国对新工业方法的垄断。英国的发展，的确靠英国在工业上的竞争者同他们的殖民市场之间的联系达二十多年之久，同时又用武力为英国贸易打开了这些市场。南美各殖民地脱离了它们的欧洲宗主国，英国侵占了法国和荷兰的所有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被逐渐征服——这就把所有这些广大领土的居民变成了英国商品的消费者。于是，英国在国内市场上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又用在国外的商品的一切可能的消费者实行自由贸易作了补充。

自资本主义兴起以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种“不对称全球化”战略一直是发达国家相继崛起的一种普遍模式。西欧列强以及后来的美国和日本在争霸过程中相互实施半隔绝、半脱钩的关税保护制度，但都不远万里、争先恐后地在亚洲、非洲、美洲通过武装割据划分势力范围，抢占可以建立密切经贸关系的殖民地，使之成为其工业原材料来源地、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处，作为与竞争对手在高端工业上一决雌雄的市场空间和战略大后方，西班牙、荷兰、法国、意大利、英国、

德国等国的崛起莫不走过了这种道路。

日本崛起的道路深受英国、德国崛起经验的影响，但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日本和当时的中国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不能运用关税控制权自主地保护它的新兴工业。所以，“不对称全球化”战略有其独特之处。与中国在1925年才把李斯特的民族工业保护主义思想介绍到国内不同，日本早在1870年就出版了介绍林肯经济顾问、李斯特主义者凯里（H. Carey, 1793—1879）经济思想的《保护税说》一书，这深刻影响并改变了近代史上中日两国不同的命运。在美国工业保护主义思想影响下，日本明治政府在1871年派遣以岩仓具视（いわくら ともみ, 1825—1883）为团长的使节团对欧美国家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九个月的考察，其目标有两个：一是请求这些国家废除19世纪50年代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二是寻找日本崛起可以借鉴的道路。

日本的第一个目标遭到了欧美列强的拒绝，但第二个目标却达到了，这就是模仿英国、德国通过武力建立殖民地的战略，确保其高端工业强力崛起的市场空间。因此，以大久保利通（おおくぼ としみち, 1830—1878）、伊藤博文（いとうひろぶみ, 1841—1909）为核心的明治维新领导集团回国后就确定了如下战略：争取尽早结束与西方的不平等地位；但在工业的重压，必须尽快吞并中国的藩属国朝鲜和中国台湾，使其接受日本低端产业的转移，并把中国大陆变成其经济殖民地，为日本高端工业的发展创造一个攸关存亡的保护性市场。这就是日本为什么发动甲午战争并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基本原因。日本的这种战略，决定了中国自此后饱受日本侵略的蹂躏，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才结束了中华民族的这种厄运。

二、美国道路：与英国道路的比较

与中国一样，美国经济的现代化也是从东部沿海围绕港口城市为核心开始的。美国在独立前，为西欧国家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以交换其工业制成品。如果这种格局延续下去，整个美国就只能成为自然资源和低端产品的输出国，与现在的拉丁美洲国家同一命运。为改变此命运，在1812—1814年的第二次英美战争后，美国通过高关税保护在东北部沿海建立起自己的价值链高端——独立自主的工业；但是，却遭到了美国南方承接英国产业转移——为其棉纺织工业提供原材料的——种植园主的强烈反对，后者不惜挑起南北战争坚持自己“输出原材料并进口制成品”的依附型发展道路。北方工业保护主义者最后赢得了南北战争的胜利，通过战后三十多年狂飙突进的工业化，在1900年前后崛起为世界第一工农业强国。

美国的崛起也遵循着“不对称全球化”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首先，对本国高端工业及其国内市场实施保护主义。这不仅与其他国家的崛起战略无异，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南北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关税一直保持在40%—50%之间；在成功地实现经济崛起的国家中，这么高的关税保护率是世所罕见的。其次，利用一切可能的自由贸易机会开辟本国高端产品的国外市场。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福克纳指出的，虽然美国“1914年对欧洲的出口占出口贸易总额的63.37%，其中主要是棉花、小麦、面粉、肉类产品和烟草。我们还必须向其他地区为制成品寻找出路”。这些其他地区，主要是指加拿大、亚洲和拉丁美洲。福克纳的

活清楚地表明，美国的工业崛起是借道于比自己落后的国家但并不依赖于这些国家实现的。虽然发达的欧洲国家是美国崛起前的主要出口市场，而且主要是农产品出口，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早在19世纪50年代初就广泛使用自主创新的收割机。这是工业保护催生美国农业机械化革命的结果：与欧洲大陆劳动密集型农业不同，美国出口的农产品实际上是资本密集型产品。

然而，美国这种“不对称全球化”的崛起道路也具有与英国道路不同的特点：由于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美国的崛起主要是通过国内经济大循环实现的。（1）国内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岁月里，虽然英国出口了四分之一的工业品，但美国出口的还不到十分之一。（2）企业严重的内向型。一般来说，只有在占领和控制了国内市场之后，美国公司才对国外市场感兴趣。（3）保护新兴工业的国内市场。通过国内市场率先取得新兴工业的领导地位，然后通过这些工业再去占领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李斯特经济学所倡导的关税保护，并不是任何产业都保护，而是要保护创新机会窗口大、报酬递增的高端和新型产业。在美国工业化的关键时刻，担任林肯和约翰逊两届政府国务卿的西华德（W. H. Seward, 1801—1872）阐明了美国通过高关税保护国内市场创建帝国战略的目的所在：“在帝国的整合过程中，联邦政府必须起带头作用，采用的办法包括：制定更高的关税以保护国内市场，从而建立一些稳步发展并最终向国外出口产品的新型工业；建立更为集中的银行体系……”也就是说，“美国既不想成为欧洲体系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不想像欧洲诸如英国、德国或日本的帝国主义”。美国的战略是在美国支配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实现崛起后，再通过自由贸易与西欧发达国家展开直接竞争。但是，因为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美国没有必要像西欧国家那样为了争夺殖民地大打出手。虽然它也为其工业品寻求出路，对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如日本、中国等强行实行自由贸易，但后者对其高端工业的崛起只起到减压阀和剩余出路的补充作用。“在1900年到1930年的三十年间，由于美国走上了对外扩张商务与投资的侵略战略的道路，国内市场（才）不断地得到了日益发展的对外贸易的补充。”事实上，美国在1894年就崛起后，但在崛起进程中，外部市场并没有像在英国、日本的“不对称全球化”崛起道路中那样发挥关键性作用；美国的高关税保护不仅为本国幼稚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保护，而且也保护了攸关其存亡的巨大国内市场规模。美国正是利用表现为内需和广大的内陆地区的国内巨大市场规模，通过孤立主义的保护主义或者说是通过“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战略实现了崛起。

美国在崛起后，走上了对外经济扩张道路。主要原因是，内需越来越不足和西部边疆“红利”的消失。虽然在美国崛起过程中，劳动者阶层的收入水平曾起过决定性作用，但到19世纪末，由于资本家阶层在确保政府通过国家干预把外国商品拒于国门之外的同时，又拒绝政府对外国商品的干预，导致了劳动者阶层分享了越来越少的生产率增益，而资本家却得到了很多，内需越来越不足以支持其工业扩张；而西部边疆，在19世纪90年代已然消失。所以，当美国在1894年崛起后，海权战略家马汉（A. T. Mahan, 1840—1914）、总统罗斯福（T. Roosevelt, 1858—1919）以及国会强势议员们一致断言，美国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要么通过他们深恶痛绝的“社会主义”政策把剩余产品在国内通过增加工人农

民的收入加以消费，要么跨越新“边疆”即海洋进军海外市场。它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由此可见，帝国主义是以内需再也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广大市场为前提的。这是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巨大推动力。

三、“不对称全球化”理论与中国的选择

对于发达的大国在历史上处于落后地位时实现经济崛起的“不对称全球化”这样一种规律，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米尔顿（A. Hamilton, 1755—1804）和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针对落后国家为什么要与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的浅度全球化状态，提出了“幼稚工业保护理论”进行解释。在自由贸易状态下，发达国家强大的工业不仅将摧毁落后国家弱小的工业，而且也将占领后者赖以生存的本国市场，从而使其丧失成长空间；而对本国高端工业实施关税保护，可以同时达到保护该国工业及其市场的双重目的，从而确保对该国崛起至关重要的高创新率、高进入壁垒、高附加值、高工资的高端工业拥有控制权和收益权。因此，汉米尔顿的经济学说和李斯特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同于所谓“普世性”世界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的，而是一种“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这种经济学的宗旨就在于，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建立关税壁垒，防止欠发达国家经济与发达国家隔离开来，阻断发达国家通过自由贸易“赢者通吃”这种高效率的市场机制毁灭欠发达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干预的目的在本质上与纠正市场失灵或者提供短缺的生产要素是不相干的，而是为了确保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市场空间，从而重构国际经济秩序。

但是，对于历史上成功崛起的国家在对本国高端工业实施幼稚工业保护的同时，为什么要与同等发展程度或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中外经济学家至今未给出比较系统的理论解释。在笔者看来，落后国家的市场对于崛起国家来说，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可以获取并确保工业崛起所需的原材料来源、过剩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和过剩资本的输出处，更重要的是，崛起国家可以通过落后国家的市场，迂回性地在更大的地理空间上与发达国家争夺原材料、商品和金融资产的国际定价权。从根本上来说，新兴的崛起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经济国家之间的竞争，即使崛起国家与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的浅度全球化状态之中，但由于国际定价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如果崛起国家没有自己可以支配的国际市场空间，那么，它就没有争夺国际定价权的筹码和回旋余地，因而它也就无法突破已有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支配地位。这就是落后国家的市场为什么对崛起国家具有重要作用的基本原因。这也是落后国家的市场虽然在美国崛起过程中发挥的是补充作用，但却不可或缺的作用。

进化生物学的“异地物种形成原理”可以为“不对称全球化”历史规律提供自然史的基础。生物学家们在研究生物进化史时发现，新物种往往不是在原有物种占支配地位的地理空间中形成的，换言之，异地物种形成是生物进化中最主要的一种形成新物种的方式。为了解释这种现象，进化生物学家们提出了“异地物种形成原理”的理论：同一物种间的竞争有利于渐进的、有效率的突变和选择，但这种竞争却阻止了新物种的形成。也就是说，当自然选择的压力有利于现有的每一种物种对环境的适应并与其他生物共演时，它禁止新物种的形成，自然选择的压力甚至导致了进化过程

的停滞。这种停滞的突破，往往发生在相对被保护的外围地区，即新物种的形成和演化要远离原物种数量巨大、竞争激烈的中心地区。这一原理证明了两点：其一，新兴力量在外围的成长，需要“相对被保护”。这也为落后大国要与发达国家处于“浅度全球化”的理论提供了自然史证据。其二，外围和边缘地区，是最有利于新生力量成长壮大的地方。这就是目前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欠发达经济走向崛起时为什么都走上了‘不对称全球化’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

在当今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中，中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处于外围和边缘地区，因此，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在借鉴发达国家历史上所走过的“不对称全球化”道路经验的同时，创造并走出自己的经济全球化之路。

首先，由中国掌控的全球价值链不可能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深度全球化中发展壮大，因为这反而有可能造成对美国的深度依赖，所以，改变所谓“中美国”的“夫妻”关系，是中国经济全球化新道路选择的基石。

世界经济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在发展中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实现与发达国家之间深度全球化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果进入其新的工业领域或从价值链低端进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制和垄断的价值链中高端，将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1）进入后的企业能否生产出经受住市场竞争的产品是高度不确定的；（2）进入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价值链中高端需要高强度的长期投资，但能否以及什么时候才得到财务回报是高度不确定的；（3）进入后将面临着外国领先者在知识产权围剿、价格战等多方面的打压。在这种听任外国资本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高风险和利润前景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发展中国几乎不可能会有企业自主选择进入该国原来没有的、技术更复杂的工业领域或价值链中高端。这是中国那些完全对外开放的领域在迈向价值链中高端上乏善可陈的根本原因。相反，通过适当地保护中国高端产业或价值链高端及其国内市场，创造一种与发达国家之间处于“浅度全球化”的状态，就可以为中国价值链高端及其核心技术的突破创造广阔的成长空间，特别是在“中国制造发展愿景”中的智能工业领域更是如此。

一旦中国在价值链高端及其核心技术方面取得成功，就可以利用广大发展中国家辽阔的地理和市场空间，建立起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技术经济领先地位和由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然后再与发达国家的价值链高端市场展开竞争。由于中国在制造业完整价值链上的优势和制造技术低成本的优势，这种战略就成为迫使现有发达国家把大部分制造业国际定价权移交到中国的重要途径。同时，中国可以实现产业升级，带动它们相继进入起飞阶段，创建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其次，以英国为代表的（包括日本、韩国等）出口导向型的“不对称全球化”道路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内需主导型的“不对称全球化”道路则应成为中国的新选择。在这方面，美国道路则为美国提供了有益借鉴；与欧洲大陆诸国相比较，19世纪美国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和收入分配更为均等化的特点，这使美国走上了典型的内需主导型“不对称全球化”道路，国内市场在美国崛起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也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愿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原因。中国应该深入研究美国“不对称全球化”道路的历史经验，超越并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内需主导型“不对称全球化”之路。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出口导向型之路，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条路不断出现障碍；而今美国与中国发生的“冲突”，说明这条路愈来愈陷入死胡同。目前许多国家之所以没有从“出口导向型”思维中摆脱出来，其重要原因是没有认识到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是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优势，对中国经济全球化道路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以中国人口为例，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规模上相当于美国、欧盟、拉丁美洲人口之和。这样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根本性力量之所在。当然，也许会有人提出，从外部市场获取能源和资源说明对外贸易在中国的重要性。然而，第一，中国在转向内需为主导的价值链高端保护主义战略后，外部能源和资源的需求量将会大幅度下降；第二，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说，中国资源和能源比较匮乏，但中国不可再生资源储备总量仍是相当丰富的，而且新能源也在不断地被发现；第三，即将到来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核心就是要解决世界经济所面临的资源和能源问题，只要中国成为这次技术革命浪潮的领导者，能源和资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问题将迎刃而解。因此，如果珍惜和保护国内市场，使之成为中国引领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强大驱动力，那么，中国就可以通过类似美国内需主导型的不对称全球化之路，最终实现崛起。（待续）